

# 论汉语国际教育中“文”的重要性

骆小所

**摘要：**中国传统的语文学经过一个繁荣发展的古老阶段，到1898年出版了《马氏文通》后，它受西方语言学的影响转向了语言学，从此，改变了汉语研究系统，使活的汉语淡化了交际作用。汉语教学应重视“文”，我们应赋予“文”以新的内容，建立符合汉语实际的学术体系，使世人学到真正的汉语。

**关键词：**语文学；语言学；新语文；汉语教学

汉语国际教育其过程必须贯穿“文”的教育。“文”包括文化、人文、文学、文字、文艺和文章等。汉语是汉民族文化的载体，这里的文化指大文化而不是小文，它几乎包括了“文”的大多内容。正因为如此，汉语研究形成了一个博大的理论体系，可惜我们现在的汉语言研究对这个体系认识不足，形成了就汉语研究而研究的现象，使汉语研究孤岛化，步入了纯语言教学。

汉语研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大体经历了语文学、汉语言学 and 现代汉语学研究阶段，其历史时间最长为语文学研究阶段。在二千多年前，语文学就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它以研究汉民族古代文献为主。古代的语文学也叫“小学”。“小学”这个词初见于《大戴礼记》。《大戴礼记·保傅篇》说：“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于小学，小学者所学之宫也……古者八岁而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西周是中国奴隶社会的繁盛时期，人分等级，当时能接受教育的是贵族。关于“小学”的概念，《周礼·保氏》说，“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可见，在周代，小学本指学习六艺。后来小学含义逐渐缩小，仅指六艺之一的“书”了，即对语言文字的学习。

“小学”是与“大学”相对来讲的，人们把那种研究中国语言文字的学科叫“小学”。在中国历史上，“小学”这个词的含义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周代，“小学”与“大学”对举，指为贵族子弟而设的初级学校。西汉时，“小学”只指文字学。东汉至隋唐五代，人们把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都纳入“小学”的内容。“大学”也可释为“博学”，它包含政治、哲理和做人的高深而广博的学问。《大学》成书于战国末年至西汉之间。《大学》的中心思想，即大学之道就在于彰明其德，并运用高尚的德行去教化民众，使己与人都能达到道德完善的境地。《大学》成为历代儒家、理学家、教育家传授伦理、政治、哲学思想的基本纲领和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提高个人修养的最重要的依据。《大学》全文的总纲和核心，

是“三纲”、“八目”。“三纲”指“明明德”、“亲民”、“止至善”三条基本原则；“八目”的中心是“修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是“修身”的基本方法，“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修身的目的。《大学》促进了世人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即并重“内圣”与“外王”之道的互省与提高，这些都成为国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学研究的重点。

国学作为中国一种特定的知识形态，它的基本构成要素与汉语具有密切关系。从本质上讲，民族特质最为突出的表现是语言；所以，国学正是汉语重新建构汉民族文化的知识谱系。国学的知识系统的重建必须从重新清理和确认真正的现代汉语着手，只有从汉语形态展开的民族特性研究才能寻找到国学之根。遗憾的是，目前国学研究和现代汉语研究没有很好的衔接。

在中国古代，“文”、“辞”、“章”几乎指同一意思，“文章”、“文辞”、“辞章”等术语都是互相联系的。与“文”、“辞”、“章”相对应的历来有以下三套：一套是“道”，它包括了道、义、理；一套是“情”，它包括了情、志、意；一套是“学”，它包括了学问、考证。这些都是指思想和情感，指内容而言。古人把它们总称为“质”，古人要求这些内容之“质”要和“文”相吻合，所以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质胜于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主张“文”与“质”的统一，即语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这种统一便是君子之笔法，这里的“文”实际是指文章或言辞，以上三套中的道、义、理、情、志、意、学问、考证等成为国学的主要内容；所以，我们只有从汉语形态展开的民族特质研究才能捕捉到国学之根。

事实上，中国的语文学研究转向语言学研究后使人非常失望。1898年出版了马建忠《马氏文通》后，标注着中国的汉语语言研究开始拉开了序幕，后经谱系式研究后，汉语言学逐步成熟，语文学的实用性逐步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中国的汉语言研究步入以语法为中心的研究。《马氏文通》机械模仿印欧语的语法结构，而使汉语以表义为主的活的汉语言步入了呆板的表形为主的人为的拟态化的语言，失去了汉语应有的特点，因此，引起了汉语研究者的不满。1918年，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届白话文小说，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语言从文言正式步入白话文，从此正式步入现代汉语阶段。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狂飙突进，和它一开始倡导“文学革命”是分不开的。文学革命的目的是打倒旧文学，建立新文学，白话文就是在这文学革命的浪涛声中从民间日常语而引入语言交际的日常化的。三十年代在上海，以陈望道先生为首的开展的“文法革命”，力图矫正近代汉语研究，特别是摒弃《马氏文通》机械模仿印欧语言弊端，倡导独立研究之新风，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法革命”的口号，较为深入地讨论汉语语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如一线制和

双轴制、划分词类的标准、析词的原则、语与文的分合等问题。但是这场文法革命，由于受西方语言学研究的影响，没有从根本上动摇《马氏文通》的基础。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受西方描写语法学的影响，汉语语法研究开始系统地运用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使汉语语法研究步入结构主义的时期。结构主义语法对汉语进行精密化分析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却由此失去了汉语与文的整体性的研究，严重脱离汉民族语言交际的实际。

20世纪50年代中期，汉语研究学界重新审视了汉语研究，既不同意传统语法以意义为主要标准的研究方法，也不赞成结构主义语法纯以形式为标准的研究方法，主张在传统语法的基础上，吸取结构主义语法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做到形式与意义的结合，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为探索汉语的真正理论所用。

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的大潮涌起，各个领域的改革促进了语言研究理论的跃进、研究方法的革新。现代汉语研究出现了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的研究景象。其中最显眼的是三个平面理论的提出，三个平面理论认为，语法研究中存在着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截然不同，但又密切联系着的平面。句法平面主要研究符号和符号之间的关系，讲的是深层次结构；语用平面研究的是语言结构的应用和转换。在句子分析中，任何一个平面的分析都是有价值的，然而又不是孤立的，只有对三个平面综合透视，才能科学地认识和把握现代汉语在交际中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随着汉语修辞学的深入和发展，语言学界和哲学界提出了语言学转向，特别是修辞学转向的学术研究方法。修辞学转向，就是科学方法的转向，是修辞学特性在科学方法的运用。修辞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新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修辞学转向其内在原因是语境研究，涉及大量文化问题。语义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语义问题，而是由具体的语境所决定，它包括了语流义变和情境义变。打破了结构主义的语言观，使汉语回到汉语自身，由语言义转向了言语义。语言义指词语在语言系统中所具有的意义，它是客观事物、现象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使用某一种语言的人们头脑中的概括反映，这种意义是抽象的、概括的、约定俗成的、相对稳定的。言语义是指人们在运用语言时所产生的与特定语境相联系的具体意义，它不仅是具体的，而且是灵活多变的，往往受交际语境、发话人的主观心境，或上下文的影响而发生种种变化，或者根据交际的需要增添了一些新的语义色彩。语言义的特点是辞面与辞内不相吻合，言语义的特点是辞面义与辞内义不吻合，它的辞面只是语言现象，深层才是实质，它意在言外，音在弦外，它追求的是“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实中寓虚”，是言语表义最大化，它以有形表无形，以有限表无限，言有尽而义无穷，空谷遗音，余韵无穷，给人以想象与联想的自由和最大的空间。例如：

(1) 当学生、家长、群众夹道送别校长张伟时，我们看到人们对他平凡一生绽放出的光辉的珍视：他是照亮孩子未来的灯塔，是秋渠乡那片土地得以富有的肩膀，是埋头苦干和拼命硬干的民族脊梁。在这个悲伤之后，我们要对得起那沉甸甸的“财富”

(《中国教育部》评论员《用生命铸就教育信仰》，载《中国教育报》，2014-03-26)

(2) 三星电子在中国启动“三星智能讲堂”公益项目，用智慧点燃梦想。“三星智能讲堂”激发了打工随迁子女的兴趣，拓展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和眼界。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用智慧点燃梦想》，载《中国青年报》，2014-04-02)

我们看了上例的例(1)例(2)时就不能从语言的角度去理解，而是从言语的角度去理解，不然“绽放出的光辉的珍视”、“他是照亮孩子未来的灯塔”、“用智慧点燃梦想”等就无法理解，这就是“文”的问题，而不是单纯的“语”的问题。所以，在汉语在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文”必然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考虑。这是我们传统的汉语教学难以解决的问题，但这种言语才是真正活的汉语。

回顾汉语研究和教学的历程，出现了这样的态势：一是以借用西方研究成果为坐标，不断引进新理论，改变汉语研究系统；二是以汉语为事实的描写为依据，不端纠正引用西方语言理论，建立符合汉语实际的学术体系。我们认为，第一种是不可取的，第二种是我们的选择。但遗憾的是，目前的汉语教学与研究中，基本追求的是第一种。中国传统的语文学已被彻底打倒。我们需要的是以中国传统语文学为依据，纠正引用西方语言理论，建立符合汉语实际的新语文学体系，使汉语回到活的言语交际的本源，它的目的是以文化(含人文)为内容，由汉语和文字表述，成为文章、辞章。

我们认为汉语研究和汉语教学确实值得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在撰写《修辞探索》、《现代修辞学》、《艺术语言学》、《现代汉语语言学理论》、《现代汉语引论》等时，就自始至终持这种观点。要使现代汉语研究和教学焕发朝气，充满活力，必须冲破纯语言研究的桎梏，做到“文”与“质”的统一。

#### 参考文献：

- [1] 骆小所. 修辞探究[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8.
- [2] 骆小所. 现代修辞学[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3.
- [3] 骆小所. 艺术语言小[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2.
- [4] 骆小所. 现代汉语引论[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 [5] 骆小所. 现代语言学理论[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8.
- [6] 骆小所. 《马氏文通》的作者及其影响[J]. 曲靖师专学报, 1991, (2).

[7] 骆小所. 语言学转向和修辞学转向的意义[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 (2).

[8] 骆小所. 略论变异修辞语言产生的心理基础及其关系意义[J].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199, (1).

[9] 骆小所. 论修辞的含义[J]. 楚雄师专学报[J]. 1994, (4).

[10] 骆小所. 艺术语言再探讨[J]. 语言文字应用, 1994, (4)

### 作者简介:

骆小所, (1948—), 云南陆良人。中共党员, 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国家汉办特聘终身专家, 泰国教育部督导委员会特聘终身专家, 泰国南邦皇家大学荣誉博士, 云南师范大学原校长, 云南省社科联副主席, 政协云南省第十届委员会常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论证专家,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专家, 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成果奖评审专家, 云南省第四、五、六届选拔有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员评议委员会专家, 教育评议组负责人。1995—2010 年云南省高教系列高职评审委员会副主任、文科分评委员会主任。1996—2010 年云南省社会科学系列高职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历任云南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所长、中文系系主任、副校长、校长等职。长期从事现代修辞学、艺术语言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创建了语言学支学科艺术语言学, 建构了深层修辞和表层修辞理论体系, 分别被专文写入《中国修辞学通史》。主持完成国家级项目 2 项、省级项目 9 项; 发表《艺术语言的弹性美》等论文 290 余篇, 出版《艺术语言学》、《修辞探究》、《语言美学论稿》、《现代修辞学》、《现代语言学理论》、《现代汉语引论》等专著和教材 29 部(套)。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研和教学成果奖 11 项, 其中“汉语言文学专业面向 21 世纪语言课程体系建设”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现代汉语》(合著) 1993 年获国家优秀教材二等奖, 《艺术语言学》获云南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2001 年被评为全国师德先进个人, 1997 年获教育部曾宪梓基金二等奖。

##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e in Chinese Teaching as Second Language

Abstract: After a phase of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started to be affected by western linguistics with the publish of

Mashiwentong. Since, the proportion of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has been dramatically lightened. In fact,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should be stressed during language teaching, especially Chinese Teaching. Thus, Chinese language could be truly spread worldwide with a comprehensive academic system.

Key words: Chinese language; linguistics; new academic system of Chinese; Chinese teaching